



山東黨史人物傳

山东党史人物传

第四集

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主 审 张敬焄
审 稿 刘金江
主 编 魏训洲
副主编 臧济红
柴本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党史人物传:第四集/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8

ISBN 7-80023-881-4

I. 山… II. 山… III. 党史-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山东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9595 号

山东党史人物传(第四集)

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875 印张 270 千字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023-881-4/K·810

定 价:12.50 元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前夕,《山东党史人物传》(第四集)正式出版发行了。我们谨将此书献给抗日战争时期成千上万在齐鲁大地上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并作为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献礼。

本书共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牺牲、病逝或工作过的 69 位革命烈士的传略。其中有: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史文彬、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李竹如、滨海区党委书记符竹庭、胶东行署主任王文,以及其他县团职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著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真实生动,壮烈感人。不但对了解、研究山东省抗日战争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本书在征集资料和编辑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各级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许多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各市地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大力协作配合,积极撰写稿件,提供和核实资料。我们在此谨致谢意。

按照山东党史人物传的出书计划,本书出版以后,对应收录的抗战时期的党史人物传略已经出齐。但由于战争时期环境恶劣,斗争形式多变,加之年代久远,资料散失,再加我们工作的疏忽,有些党史人物,甚至是有重要影响人物的传略,可能仍有遗漏。为此恳请广大读者,特别是老领导、老同志和知情者,积极提供线索和补充意见,我们将在今后的编辑出版中补编。

由于本书收录的人物传略稿源,来自各个方面,加之我们的水平所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五年三月

目 录

史文彬.....	1
任作民.....	8
李竹如	12
王 文	18
符竹庭	22
黄 骅	28
朱毓淦	37
杜子孚	42
常恩多	45
汪 洋	50
钟效培	61
朱冥阶	64
于己午	72
陆升勋	76
李贞乾	80
石景芳	86
韩子衡	92
徐维中	96
朱 程.....	101
袁复荣.....	106
张智忠.....	111
徐尚武.....	117
马本斋.....	120

马晓云.....	125
石潇江.....	133
王爱中.....	137
远静沧.....	140
吕世隆.....	146
许 国.....	152
陈若克.....	158
李毓祯.....	162
辛 锐.....	169
辛俊卿.....	173
程若晓.....	178
崔宜平.....	182
马同贵.....	185
熊善隆.....	188
吴 涛.....	192
刘齐滨.....	198
李思孝.....	202
李恩庆.....	206
褚雅青.....	209
邸玉栋.....	216
魏金三.....	219
阎登三.....	224
刘怀文.....	227
冯旭臣.....	230
宋 光.....	234
王凤麟.....	237
张策平.....	242
林 江.....	245
赵大川.....	249

杨荆石	253
石庭悦	259
武大风	263
张允峙	268
李本荣	272
李枚青	276
刘汉英	283
米英俊	287
鲁宝琪	291
苏勋卿	300
王克寇	304
王玉琢	312
张 硕	315
任常伦	320
文立征	324
丁润生	328
孙乾义	332

史文彬(1887—1941)

史文彬,1887年农历10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城县(今高青县)史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那年夏,黄洪泛滥、暴雨如注,青城县“全境成泽国”,史家的田地、房屋被淹没,被迫举家迁住济南,靠亲友的赞助在西更道附近开杂货铺为生。十二三岁时,因受欺诈骗官司,史家一贫如洗,搬进废弃的关帝庙栖身,父母相继在忧愤和贫病中去世,靠兄嫂支撑家庭。直到14岁时,史文彬才到教会办的济南公益学校半工半读,3年学习,3年谢师,6年后转入济南铁厂做工。

苦难的童年,少年的坎坷,使史文彬既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又磨练出顽强的性格。在济南铁厂,面对厂主的剥削和工头的残暴,他先是暗中串连工友消极怠工、破坏工具设备,后于1912年毅然发动工人进行反抗。这是山东,乃至全国工人阶级一次较早的自发斗争。

在铁厂斗争中,厂主勾结警察欲逮捕史文彬,他被迫逃离济南,于当年隆冬考进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当上了一名铁工。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近代机车修理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工厂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培养了史文彬良好的工人阶级素质。他阶级觉悟高,技术精湛,善于帮助团结工友,敢于同工头、厂方作斗争,深得广大工人的敬重和拥戴。一提起麻子师傅(史文彬脸上有点麻子),工人佩服,工头挠头。

1918年夏,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到铁路工厂半工半读,得到了史文彬等人的热情帮助。对此,何长工后来回忆说:“记得我们那位麻子师傅,钳工技术很高……费了

很大苦心来教我们，把自己的全部本领拿出来，唯恐我们学不会。”史文彬等也从学生们的口中听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从学生们手里读到了李大钊等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劳工神圣》等宣传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工厂，和史文彬等促膝谈心，讲解救国拯民的大道理，更使史文彬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决心不辱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投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去。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史文彬立即组织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副厂长刘家骥是卖国贼曹汝霖的女婿，平时横行霸道，欺压工人，辱骂进步工人，为“劣马害群”，五四运动爆发后压制工人，公开扬言“谁闹事就开荤”。史文彬组织一批工人，手持工具，抬着煤油桶，焚烧了刘家的大门，一向作威作福的刘家骥仓皇逃窜。初次交锋获胜，使史文彬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

这年的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怒。5日夜晩，在史文彬等人的带领下，长辛店几百名工人提着红灯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释放爱国学生”、“打倒卖国贼”等口号。此后不久，史文彬又动员500多名工人参加“救国十人团”，开展了发动工人捐款救国，抵制日货，举行街头讲演和赴北京请愿等一系列活动，显示出了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0年4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的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来到长辛店，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史文彬等给予热情接待安排，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指导和史文彬、陶善综等人的积极操办，1921年1月办起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除邓中夏等人外，李大钊、何孟雄、罗章龙也到校讲课，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既教文化、又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史文彬在参加管理学校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学习，无产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不久被吸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成为其中唯一的工人成员。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1921年5月1日，史文彬组织长辛店工人举行了盛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游行大会和长辛店俱乐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当地工人外，还有来自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进两千人。在大会上，正式宣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会后，史文彬带领工人队伍进行了游行。其声势之大，被邓中夏称赞为“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团结帮助工人群众，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成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因此，当时在全国工人的心目中，长辛店工会是“天国”，纷纷派代表来参观学习，上海的《共产党》月刊也称赞其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史文彬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如邓中夏所评价的那样：“无论按阶级成份，按觉悟程度，按人的诚恳忠实，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当月，史文彬由邓中夏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十九条，号召全国工会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争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后，各地工会奋起响应，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8月10日，党领导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长辛店工人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奋斗”。作为北方书记部成员的史文彬出席了这次会议，被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并接受了领先发起罢工的光荣任务。

8月24日上午，随着一声尖厉的汽笛声，长辛店罢工开始。紧接着，车间停产，机车熄火，列车停驶，昔日熙来攘往的车站变得冷冷清清、一片死寂。随后，京汉铁路中段、南段的工人也首尾相应，举行了罢工，形成了同盟大罢工的态势，使京汉路南北交通中断。

陇海、津浦、京绥、京奉、正太等兄弟工会也纷纷发来电报声援或派代表前来慰问，罢工浪潮呈不可阻挡之势。

浩大的罢工阵势，不仅把老板和大小工头吓得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干预，连北京的资本家也慌作一团，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不得已于26日答应了工人的九项要求，开除了几个为工人切齿痛恨的工头，为工人增加了月薪等。这次“八月罢工”的胜利，拉开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筹委会议在郑州召开，史文彬当选为副委员长。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月底，史文彬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以及京汉路所属的16个站区工会负责人赶赴郑州，准备如期组织成立大会。不料，直系军阀吴佩孚却深怕危及他的统治，撕下了一贯标榜“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以时局不稳为借口拒绝召开大会。史文彬、李震瀛等代表筹委会同吴佩孚进行了谈判，据理力争，严正指出：成立总工会是工人的权利和自由。2月1日上午，大会如期召开，大批代表和来宾冲破军警的拦截涌向会场，吴佩孚派大队军警包围、冲击会场，使大会遭到破坏。史文彬等大会主持人愤怒地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强权无公理，工人要自由！”

为了抗议反动军阀的蛮横干涉，当日晚，筹委会召开各分会代表会议，决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以坚决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会后，史文彬立即登上北去的火车返回长辛店，并在车上向京汉路北段的代表部署了罢工问题。到长辛店后，他又连忙召开党团和工会委员会议，传达郑州会议决议，研究长辛店罢工计划。

2月4日上午9时，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随着汽笛的响声，潮水般地涌向罢工誓师会场娘娘宫。史文彬在宣读总工会罢工宣言后慷慨激昂地说：“民国约法上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何以我工人无之？‘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这时，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

口号声：“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罢工！”不仅长辛店举行罢工，在3小时之内京汉路保定、正定、石家庄、郑州、江岸等站都开始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

京汉铁路总罢工的实现，使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大为震惊。他们一面勒令工人复工，一面施展手腕，分化瓦解罢工队伍，派宛平县知事汤小秋找史文彬单独谈话。对此，史文彬不畏强暴，不受诱惑，严正指出，我“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它。”

反动军阀见软硬兼施无效，便于2月6日深夜包围铁路工厂，逮捕了史文彬、吴雨铭等11名罢工领导人。7日凌晨，1000多名工人聚集在关押史文彬等人的火神庙兵营门口，向反动军警要人，一齐高喊：“还我工友！还我委员！”反动军警竟疯狂地向工人们开枪射击，造成了4人罹难、5人重伤、轻伤无数的惨案。

在长辛店罢工遭镇压的同时，郑州、石家庄、江岸等地的罢工也被反动军警镇压下去，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当场壮烈牺牲，法律顾问施洋亦于当日被捕，各地都有大批工人伤亡，这就是中国工运史上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就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被反动军阀血腥镇压了。

“二·七”惨案后，史文彬等人被押解到保定监禁，受尽了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敌人将史文彬按跪在三角铁块上，用皮鞭抽打得他脊背上血肉模糊，并拉往刑场“枪毙”。但他“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有权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集会。这期间，王尽美曾代表北方区委探望狱中同志，这更坚定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在狱中，史文彬同其他同志一起建立了党小组，在坚持斗争的同时，又发展工人出身的同狱难友张士汉入党。

1924年10月，党借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机营救出保定狱中同志。此时工人运动处在低潮期，一些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甚至有人退出革命阵营，而史文彬则通过狱中斗争更加坚定了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决心。出狱后，他立即拖着孱弱的身体赶往天津面谒北上的孙中山，为因参加罢工失业的工人请求复工。1926年

底，北方区委任命史文彬为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和保定铁路工会委员长。他带领工人同工贼作坚决斗争，使当地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都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二·七”罢工两周年的日子里，他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继续当选为副委员长。史文彬在“二·七”纪念册上发表《为“二·七”死于忠义的工友二周年纪念放声一哭》的文章，呼吁“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及反对、破坏我等团体的败类血战！……誓死前进，以做‘二·七’诸烈士的继续者！”3月间，他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赴京汉路各站抚慰“二·七”难友家属，因工贼告密再次被捕，并被判4年徒刑，后经张家口工会保释。7月，北伐战争开始，史文彬奉党组织的指示组织铁道大队，先是参加国民军胡景翼部，在南口战斗中身处危境英勇斗争；后又转去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带领铁道大队抢修铁路，支援北伐，保证了铁路畅通无阻。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加入国民革命政府，任劳工部司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文彬随党中央迁往上海转入地下，周恩来指定他参加中央特科，负责中央的交通工作。他经常扮做商人接送掩护来中央汇报的外地同志，屡次机智地化险为夷。当时任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后来回忆说：“那是非常可靠的”，“他的斗争有故事性”。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史文彬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以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声望和功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9年初，党中央任命史文彬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全力传达贯彻六大决议精神，战胜了白色恐怖下的重重困难，在豫南和豫北重建了两个特委，并指导各地党的工作，使全省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党的六大之后，党内先后出现了几次“左”倾机会主义，使党经历了一段极端困难时期，作为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史文彬，虽然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过斗争，但他因为错误地参加了罗章龙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参与了分裂党的活动，史文彬和张金保等被

开除出党，并且断绝了他们的经济供应。为了摆脱“非常委员会”和受生活所迫，1931年6月，史文彬以“到长辛店开展工作”为借口，携妻子儿女5人返回山东济南。

尽管脱离了党组织，但史文彬仍时刻挂念党的事业。他先在济南找党组织力求恢复工作，在联系不成的情况下被迫返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故乡青城县，隐姓埋名，暂时隐居下来。他靠亲友资助在城关开修表铺维持全家的生计，借开展业务之机，到济南和向过路客商打听红军、共产党的情况。并向亲友以讲见闻方式宣传共产党有光明前途。为此，国民党县警察局以其“来路不明，思想可疑”为由将他拘留审讯，后因敌人抓不到证据和朋友保释才恢复自由。

1941年冬，八路军部队在青城附近县开展抗日活动，史文彬闻讯后，冲破日伪的封锁线和国民党顽军的防区，几次同他们联系，终于经清河区党委以电报形式向中央请示获准，回到了革命队伍——清河区党委机关。当时，他老泪纵横激动地说：“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但令人惋惜的是，身体异常瘦弱的史文彬经连日劳顿突患重病，几天后即病逝于清河区委机关驻地博兴县纯化镇，时年54岁。

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那些为革命洒尽热血的革命先烈们。1984年清明节，中共惠民地委、惠民行署将史文彬的骨灰移往渤海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追悼这位早逝的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传 华）

任作民(1899—1942)

铁窗风味催人老，魂断长空杜宇声。遍体烙痕斑斑赤，苛刑重重死复生。血肉受残心犹铁，愧煞摇尾乞怜人。品概如斯吾党杰，英风千古鬼神惊。

.....

这是莫文骅在延安追悼任作民逝世时写下的诗篇，字字句句真实地再现了他在敌人法庭上、监狱里与敌英勇斗争的英风铁骨，讴歌了这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任作民，乳名任菊，又名培度，1899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今汨罗县)垫塘乡。他小小年纪就忧国忧民，为乡亲们啼饥号寒而冥思苦想。初中毕业后考入长沙市省立农业学校。他曾经天真地设想，用采用良种，改革耕作技术等措施来增产粮食，使穷苦的乡亲们得以温饱。他还为要一块试验田，和伯父争辩几次，以致气得病了一场。1920年4月，族兄任新典约他去上海。于是，他沿大江东去，进入由陈独秀、杨明斋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并秘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这时任作民才懂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这年冬天，由刘少奇介绍，任作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21年春天，当中国大地上马克思主义小组尚在兴起之时，任作民便与任弼时、肖劲光等10余人去苏联。抵达海兰泡时，组织决定他暂时留下，在俄国红军中国支队做政治工作。他慨然应允。半年后，他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1月，由罗亦农、刘少奇介绍，转为建党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2月，共产国际经过考察，调他到远东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1924年底，任作民往返于赤塔、伯力等地，从事苏联境内的中国工人运动，主编过报纸《工

人之路》，担任过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等职。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受了锻炼，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5年春天，任作民奉党的指示回国，在党中央担任秘书，兼任会计工作。1927年3月，随党中央到武汉，在陈独秀办公室工作。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宁汉合流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极端危险和紧张的时刻，设法保护和转移一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

1927年秋天，任作民被派到河南省开封市，担任河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是化名易云的周以栗。他们在铁塔附近一条小巷里租屋住下，日夜为重建和发展河南各地的党组织而操劳。一些党组织又重新恢复和建立，并开始了斗争。

残暴的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省委机关经常转移，设法躲开特务和叛徒的盯梢。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28年4月15日清晨，周以栗和赵天明等在住所被捕。任作民上午9时如约前往，在门前没有发现危险信号，便开门进去，立即被埋伏的特务扭住。在敌人的军法处里，他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回答敌人，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给他上刑，被压6次杠子，昏死6次，醒来还是那几句话。任作民身体本来就虚弱，重刑之后，皮开肉绽，奄奄一息。第二天，他昏迷不醒，持续高烧。敌人怕他死掉，捞不到共产党的情报，让医生来狱中治疗，10天过后，他才脱离危险。

接着，任作民被转移到第一监狱。这里的政治犯多达300多人。他身体稍微转好，就组织难友进行艰苦的狱中斗争。任作民把难友编成若干小组，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各种读书、时事讨论活动。同时，采用各种形式与敌人作斗争，争取与狱外通信、准予家人探狱、改善伙食等等。

由于任作民和周以栗的身份始终未暴露，因此，敌人宣判他一年徒刑。

他出狱后，许多同志向任作民表示慰问，他坦然一笑说：“只要